

# 文化诗学的历史维度及梁氏历史研究法的方法论启示

于伟

(北京语言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0083)

**摘要:**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文化诗学研究的价值和启示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化诗学研究的目的明确新方向。梁启超之历史研究的目的“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或可移来点拨文化诗学的研究目的;其二,为历史语境的重建提供新方法。梁启超之史料的搜集鉴别、史迹的论次组织、史家德才学识的培养与达成,均可为文化诗学跨文学、史学研究,提供重要的方法指导。

**关键词:**文化诗学;历史语境;历史研究法;屈原研究;陶渊明研究

中图分类号:10-0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8-7699(2015)05-0081-07

尽管历史与文学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也有不少学者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或以文学为资料探究历史,但我们探讨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文学研究的影响,还需要找到历史与文学相契合的切入点。在这个契合点上,我们讲究回到事件本身,讲究文学研究的历史化与语境化,讲究将文学现象放回到其发生、生成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审视,希望以历史文化的视野对文学文本进行细致地分析、解读与评论,在这种对文学文本的研究中,不仅让文学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自然呈现出来,而且能求得真事实、发现新事实、建构新意义和赋予新价值。这种对历史与文学契合点的探寻,即是新历史主义的文学研究模式,或曰文化诗学。

## 一、文化诗学研究的历史之维

### (一)文化诗学

文化诗学,或曰新历史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随即传入中国学界并引起注意的。从90年代开始,这种研究方法渐渐被中国学者运用于具体的研究实践之中,并逐步形成了文化诗学研究的两大流派:一为直接师承并致力于阐释西方新历史主义文论或曰文化诗学的“漳州师院派”,代表人物是刘庆璋、林继中等;一为植根中国文学土壤,直面当下文化现实,传承、转化中国文学研究传统,会通、熔铸西方文化、文学理论而来的“北京师大派”,代表人物为童庆炳、李春青等。<sup>[1]</sup>以两大学派为代表的一批认同文化诗学研究的学者,始终如一地坚持这一文学研究的理想,既脚踏实地又追求融会贯通,已使文化诗学在当下文学研究界蔚然成风。

根据李春青教授的看法,文化诗学可以看成是文学理论研究三大转向的集中体现:从哲学转向历史,从理论转向阐释,从审美转向文化。<sup>[2]</sup>也就是说,文化诗学视野下的文学研究,将扬弃用高度概括、抽象的

收稿日期:2015-05-30

基金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现代中国学术传统对文化诗学理论建构的启示”(15YJJG01)

作者简介:于伟(1982-),男,山东东平人,北京语言大学研究生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概念、范畴来指代一切具体文化现象,剥离其原本的具体性、独特性,只存其共性、一般性的研究法,它将回归到文学文本生成的具体的历史与文化语境,在复杂多维的历史文化联系中,细致考察和审视文本,并在获得全面、多维的深入理解之后,对其进行描述、梳理与阐释,从而完成对文学文本的价值呈现与意义建构。如此看来,文化诗学的研究模式,有三种基本的研究纬度,即文本、文化与历史。文本的纬度,强调对文学作品、文学现象的细致分析;文化的纬度,强调将文学艺术作为文化的一种样式来对待;历史的纬度,强调对文学的解释要深入作品产生的具体的历史情境与肌理。下文中,笔者将以文化诗学的历史纬度为主要探讨对象,兼顾文学与文化,重点厘清文化诗学的历史语境化研究的具体内涵与操作路径。

## (二)历史之维

### 1.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

新历史主义之新,是相对于历史主义而言的。历史主义强调历史的总体性发展,强调社会发展规律支配着历史的进程,认为人类历史的发展具有某种必然性,坚持历史对社会与政治的基础性作用。新历史主义在批判旧历史主义的基础上,提出了新的历史观,即“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所谓“文本的历史性”,是说“任何文本都是历史的产物,受历史的制约,具有历史的品格”<sup>[3]</sup>;所谓“历史的文本性”,是说“任何历史(包括历史活动、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历史作品等),……都是不确定的文本,我们总是以今天的观念去理解历史‘文本’,改造与创设历史文本,不断地构设出新的历史来,而不可能把历史复原”<sup>[3]</sup>正是在这种新的历史观基础上,文化诗学的研究者们认识到“任何文本都必须放到原有的历史语境中去考量,才能揭示文本的本质”<sup>[3]</sup>,同时,他们在意识到无法真正还原历史本真状况——所谓历史不过是一种临时性的文本之后,提出要“想尽一切办法去‘重建’‘似史’的历史文化语境”的主张。<sup>[3]</sup>

### 2. 文本的历史语境化研究

“文本的历史性”的观点,使持文化诗学研究路向的学者们,在扬弃追寻文本的主题、揭示语言奥秘、研究作品的修辞等“内部研究”的同时,开始以历史文化的眼光来关注研究对象,力求把研究对象放置到其生成、演变的具体历史语境中去把握,在充分考虑、揭示研究对象的历史与社会关联或曰文化网络基础上,解释文本的意义并建构其价值。这种将“研究对象置于具体语境中来考察,而不是抽象为一种独立的存在来考察”<sup>[4]</sup>的研究策略,我们称之为文本的历史语境化研究。这种历史语境化研究的要点是:“打破传统的‘历史—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看作历史的一个组成部分,一种在历史语境中塑造人性最精妙部分的文化力量,一种重新塑造每个自我以致整个人类思想的符号系统。而历史是文学参与其间,并使文学与政治、个人与群体、社会权威与它异权利相激相荡的‘作用力场’,是新与旧、传统势力和新生思想最先交锋的场所。在这种历史与文学整合的‘力场’中,让那些伸展的自由个性、成形的自我意识、升华的人格精神在被压制的历史事件中发出新时代的声音,并在社会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中诉说他们自己的活动史和心灵史。”<sup>[5]</sup>

### 3. 历史文化语境的重建

文化诗学研究者,在确定了其文学研究的基本路向即历史文化语境化研究之后,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历史的文本性。想要将研究对象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而具体的历史事实早已烟消云散,我们今天的历史书除却资料碎片化、不完整之外,最大的问题是它的文本性与暂时性。面对这个问题,童庆炳提出自己的观点:“要想把文学作品放回到原有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去把握,就只能走‘重建(历史)’之路,此外没有别的路可走。”<sup>[3]</sup>“‘重建’的意思是根据历史的基本走势,大体框架,人物与事件的大体定位,甚至推倒有偏见的历史成案,将历史资料的砖瓦,进行重新的组合和构建,根据历史精神,整理出似史的语境。”<sup>[3]</sup>并且,据童先生的意见,在重建历史的过程中,不仅要寻找尽可能多的史料,还要充分发挥建构的想象力,使支离破碎的史料产生意义。

童先生言尽于此,我们却仍有疑云:应该根据怎样的历史精神,对历史资料进行重组与建构? 如何对

历史资料进行重组与建构?如何搜集与鉴别史料?如何培养与发挥史家的洞察力与想象力?笔者认为,既然文化诗学脱胎于新历史主义,既然我们从事文化诗学研究要搜集史料、重建历史语境,也许我们从历史学家的历史研究方法那里,可以获得些许启示。本文在此拟以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运用这种历史方法研究文学的文章为例,探讨其历史研究法对文化诗学研究的价值。

## 二、《中国历史研究法》对文化诗学研究的价值

《中国历史研究法》是梁启超1921年在天津南开大学的讲演稿,1922年1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正式出版。现在的出版社在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时,往往会把梁启超在1926年至1927年间在清华大学演讲的《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合并出版,给全书冠以《中国历史研究法》之名。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补编》(为叙述方便,下文统称《中国历史研究法》),是他二十多年史学研究的积累,是他在积极吸收、借鉴西方近代史学理论,扬弃、发展中国传统史家的理论主张,融会中西史学精神而生的“宁馨儿”。《中国历史研究法》主要论述了史学研究的目的、意义、范围和旧史的改造;史家需要涵养的四长:史才、史学、史识与史德;历史的因果和动力;史料的搜集、鉴别与整理等。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对文化诗学研究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为文化诗学研究的目的明确新方向。文化诗学研究将文学现象放置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究竟所为何事,有何研究贡献,必先指明。梁启超说历史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这些或可移来点拨文化诗学的研究目的。其二,为历史语境的重建提供新方法。文化诗学研究究其根源,与西方新历史主义有不解之缘,但文化诗学的研究者多属文学研究界,与史学研究有学科界限之隔,不容易通透。梁启超之史料的搜集鉴别、史迹的论次组织、史家德才学识的培养与达成,均为文化诗学跨文学、史学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方法指导。

### (一)为文化诗学的研究明确新方向

与童庆炳将文学的审美特征作为文化诗学结构的“一个中心”<sup>[6]</sup>,立足中国的社会文学艺术现实积极追求文学艺术的意义与价值,兼顾文学的内部研究与外部研究,不仅关注文学文本的意义和价值,更关注文学的深度模式不同<sup>[7]</sup>,李春青将文学的审美化研究概括为“审美诗学”,并将其置于与“文化诗学”对立的地位,他指出:“‘文化诗学’与‘审美诗学’是不兼容的,前者正是作为后者的否定而出现的。他们分别代表两个时代的精神追求与价值取向……一个(审美诗学)是‘意义建构’的,一个(文化诗学)是‘追问真相’的,二者有着迥然不同的学术旨趣。”<sup>[2]</sup>在李春青看来,文化诗学关注的是文学现象的生成机制与政治、文化意蕴,是以追问真相为旨归的,是一种对被层层伪装遮蔽的真相的祛魅行为,其背后所依托的思想基础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追问真相的永恒冲动。当然,李春青并未否认文化诗学对意义与价值的重构,在他看来“文化诗学不标榜价值,不预设意义,而是在对文学艺术现象的研究过程中让价值和意义自然呈现出来。”“文化诗学看上去像是揭示真相而不是意义建构,但实际上是通过揭示真相来进行意义建构。”“文化诗学以一切人文价值为自己的底线,其研究目的不是消解、颠覆传统的人文精神与审美趣味,而是力求对它们有更深刻、更符合实际的理解与把握。”<sup>[2]</sup>

两位学者的学术追求显然存在不同之处。一位重视文学的审美性,强调文化诗学研究应“内外兼修”,致力追求与建构文学艺术的价值与意义;一位关注文学“事件”性,强调文化诗学研究应更多地走向事实及其关联,致力于揭示文学的真相,让价值和意义自然呈现。两位学者“同出而异名”,本文虽无意深究其原因,但其学术旨趣的差异,让我们对文化诗学的具体操作与研究取向产生了疑惑。解惑之道理应在“万物并作”之时,“吾以观复”。既然两位学者都强调文本的历史性,认同文化诗学的重要研究路径——历史文化语境化研究,那就从这里入手。

上文已经提及,历史已幻化成烟云,手不能触目不能及,只能通过重建历史文化的语境,才能开展文化诗学的研究。重建历史文化语境是困难的,可行的道路只有寻找尽可能多的史料加以鉴别,去粗取精,精心组织,并给予其新解释。而在此过程中,如没有明确的“寻求真事实”“予以新价值”的意识,以及相对明确的新意义和新价值预设,这种对史料的寻求是不能想象的。梁启超认为:“历史的目的是将过去的真事实予以新意义或新价值,以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sup>[8]129</sup>其实,这也是中国传统史学的精义所在。这种旨在打破历史与文学的二元对立,将文学文本放置在其产生的具体历史文化语境中进行考察的文化诗学研究,其实必然地带有现实文化社会赋予的功利动机、时代需求和意义与价值预设,试图在对文学文本的历史语境的重建与考察中,求得真事实、新事实,以安放新价值与新意义,在此过程中并且有可能使原来预设的价值与意义得到更新与升华,最终获得供现代人活动借鉴的优秀学术成果。

如此看来,文化诗学的学术旨趣,应扬弃审美性的“一个中心”,扣住对历史与文化有意义、有影响的、不区分美丑的文学“事件”,自觉走出审美的乌托邦,主动承担起现实社会文化发展的责任与需求,预设、勾勒出当下所需的新意义与新价值,求得、透视纷繁复杂的文学真相、新历史事实,并将这些或许已然僵死的事实组织好并赋予其新意义及新价值,使其重新焕发生机。如此,历史文化的语境才真正得以建立,文学的“真相”才能历历在目,此时,文学现象的新价值与新意义才能得以自然呈现。换句话说,只有我们赋予历史史料以新价值与新意义,历史语境才能得以重建;只有历史语境得以重建,文化诗学所追求的为文学现象祛魅、文学的新价值与新意义才能自然呈现。而如此自然呈现出的新价值与新意义,或许已经与我们预设给历史事实的价值与意义已相去甚远,但是这种因当下的我们给予史料以价值和意义而产生的文学现象的新价值与新意义,才真正是文化诗学所追求的价值和意义,也才是可供现代人活动之借鉴的有益成果。

## (二)为历史语境的重建提供新方法

童庆炳曾经对历史语境与历史背景做过细致的区分,在他看来两者既有联系,又有不同。联系是两者“都力图要从历史的角度去理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不同是“‘历史背景’只是关注到那些作家作品和文学的发生和发展,产生于哪个历史时期,哪个历史时期一般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是怎样的。……这完全是浅层的联系。‘历史语境’则除了包括‘历史背景’要说明的情况之外,要进一步深入到作家、作品产生的历史具体的机遇、遭际和情景之中,切入到产生某个作家或某部作品或某种情调的抒情或某个场景的艺术描写的历史肌理里面去,这就是深层次的联系了。这样,对于历史语境来说,就需要历史地具体展现大到文学思潮的更替的原因、小到某部作品细节描写的文化语境和情景语境,并结合该文学现象做出深刻而具体的解释。”<sup>[6]</sup>对这种历史语境的重建,李春青教授有过自己具体的设想,“例如我们研究苏东坡,我们可以把苏东坡年谱、苏东坡的别集、《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邵氏闻见录》、《东京梦华录》为代表的一大批宋人笔记放在一起翻检、比对、梳理,凡是与当时文人士大夫衣食住行、读书、写字、科举、做官、文人交游、作诗、作文、作画相关的材料都联系起来,以东坡年谱为纲,构成一个具体的、生动活泼的生活情境,在这里来看东坡的文学思想与哲学思想,那就是一种关于苏东坡的文化诗学的研究了。”<sup>[2]</sup>

历史语境的概念已然明晰,重建历史语境的路径也已明确,但具体的重构历史语境的操作方法,两位学者却还语焉不详。李春青教授提到将收集到的史料放在一起翻检、比对、梳理,那么我们在面对斑驳庞杂的历史资料时,又该如何进行翻检、比对、梳理呢?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已然给出了可行的方法。

### 1. 排比、联络法

“大抵史料之为物,往往有单举一事,觉其无足重轻,及汇集同类之若干事比而观之,则一时代之状况可以跳活表现。此如治庭园者孤植草花一本,无足观也,若集千万本,蔚以成畦,则绚烂炫目矣。”<sup>[8]61</sup>梁氏此言,意在表明对史料之搜集、梳理,应在尽力博览之际,以奇异之眼做特别观察,搜集同类或相似之事项



综析比较,如此则可以从寻常史料中,看出许多重要的意义来。梁氏认为,“诸如此类的事实很多,散落凌乱时似毫无价值,一经搜集排比,意义便极重大。”<sup>[8]131</sup>如果说排比法可以适用于同时期的材料,则联络法则适用于时间有先后的材料:“许多历史上的事情,顺看平看似无意义,亦没有甚么结果,但细细的把长时间的历史通盘联络起来,就有意义、有结果了。”<sup>[8]131</sup>由此,梁氏感慨说:“所以历史家的责任,就在会搜集,会排比。”<sup>[8]131</sup>或许,我们可以从梁氏的话中得到启发:文化诗学研究者的责任与价值,就在于对史料会搜集、会排比、会联络。

## 2. 钩沉、旁证法

如果说排比联络之法,主要适用于资料充分、无须特别搜集之普通史料,那么钩沉、旁证的方法,则主要用于资料匮乏、需博搜侦察之史料。

梁氏认为,遇有“吾侪所渴欲得之史料而事实上殆不复能得者”、“一人之言行、一事之始末,在正史上其史料缺乏已极”者、“旧史中全然失载或缺略之事实”者、“有为旧史家故意湮灭或错乱其证据者”,治史者不必完全绝望,宜博搜旁证,或能得意外之发现。<sup>[8]64-67</sup>梁氏举例甚多,我们转述一例以观其效。梁氏举孙诒让作《墨子传》为例,说《史记》中关于墨子的记述仅有短短 24 字,史料可谓极度匮乏,孙诒让生活于墨子两千年后,却能作一极博赡详实的数千言的《墨子传》,为何?“此无他谬巧,其所据者皆人人共见之史料,彼其爬罗搜剔之术,操之较熟耳”<sup>[8]65</sup>。何意?在梁氏看来,此乃孙诒让博搜旁证,将散落残存于诸多历史古籍中的逐条史料苦心搜集编撰而成,而一般人之所以无成,只因缺乏敏感与历史意识未曾察见到罢了。

另外,梁氏还提出新注意法等,强调重视史家向来不重视的材料,予以新解释,引出新事实,寻得新意义。这点倒与西方新历史主义的代表人物格林布拉特的观点有相似之处。格林布拉特“在进行‘综合’研究时,不太注意那些传统主流话语,而是对以往不大被人注意的、边缘化的材料颇有兴趣。”<sup>[2]</sup>

当然,文化诗学意义上的语境重建与历史学意义上的历史研究,终究还有差别。将历史研究中的史料搜集的排比、联络法,钩沉、旁证法,新注意法等运用在语境重建上,是否有效也许还需进一步论证。下文我们将通过梁氏自己的文学研究,探讨“求得真事实”“予以新意义”“予以新价值”“供吾人活动之资鉴”的历史研究法,对于文化诗学的历史语境重建及文学研究的适用价值。

## 三、梁启超文学研究的历史语境化操作

梁启超曾说:“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一是作者个性”<sup>[9]189</sup>,所以他非常偏爱那些“能够在作品中把他的个性活现出来的”作家。在梁氏看来,屈原和陶渊明则是其中翘楚,他有专门的文章来研究屈原与陶渊明的个性品格,即《屈原研究》(1922)及《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1923)。这两篇文章是梁启超学术思想发生转变之后的作品,也是梁氏从历史的角度研究文学的代表性作品,我们就以两篇文章为例,继续探讨梁氏的文学研究对当下文化诗学方法论建构的启示。

### (一)梁氏文学研究的目的:求得真事实,赋予新价值

在《屈原研究》一文中,他赋予了屈原迥异于前人学者不同的精神品格:“易卜生最喜欢讲的一句话:All or nothing(要整个,不然宁可什么也没有)。屈原正是这样的见解。‘异道相安’,他认为和方圆相周一样,是绝对不可能的事。中国人爱讲调和,屈原则不然,他只有极端。‘我决定要打胜他们,打不胜我就死’,这是屈原人格的立脚点。他说也是如此说,做也是如此做。”<sup>[9]169</sup>梁氏这话,带有石破天惊的味道,往昔学者们勾勒出的忠君爱国的屈原形象,到梁氏这里土崩瓦解,他所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像易卜生、尼采一样,带有极端个人英雄主义色彩的屈原形象。在梁启超的文章里,我们看到了一个“认定真理正义,和流俗不相容”“独立不迁”“伏清白以死直”的具有西方现代意味的、中国现代文学所树立的为了理想信念,

宁可被家乡、国家所放逐,不惜孤独地向死而在,坚决反抗流俗、反抗“恶社会”的“狂人”般的“战士”形象。<sup>[10]</sup>并且,在文中还可以明显地发现,原来前辈学者笔下屈原的“恋人”——楚怀王,也已经被梁启超置换成了“那个时候的社会”。梁氏说,屈原“是一位有洁癖的人为情而死。他是极专虑地爱恋一个人,定要和她结婚。但他却悬着一种理想的条件,必要在这条件之下,才肯委身相事。然而他的恋人老不理睬他!不理睬他,他便放手,不完结吗?不不!他决然不肯!他对于他的恋人,又爱又憎,越憎越爱。两种矛盾性日日交战,结果拿自己的生命去殉那‘单相思’的爱情!他的恋人是谁?是那时候的社会。”<sup>[9]163</sup>前人论者,多从忠君爱国的思想出发,认为怀王与屈原君臣,好似恋人,屈原作为“香草美人”对怀王念念不忘,尽管被怀王“放逐”。梁氏之所以能一改旧说,化“君”为“社会”,跳出旧思想的包围圈,均与他生活在现代民国,所思所想均为“改良”“革命”有关。

在《陶渊明之文艺及其品格》一文中,梁氏设问并作答:“渊明何以能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一定有他整个人生观在背后。他的人生观是什么呢?可以拿两个字包括它,‘自然’。……爱自然的结果,当然爱自由。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斗的什么?斗物质生活。”<sup>[9]203-204</sup>有论者指出“梁启超拈出‘自然’、‘自由’二词论陶,极符合陶渊明实际,实属首创,开启了后代学人以‘自然’、‘自由’论陶的先河。”<sup>[11]</sup>此处所谓自然,不是指自然界,而是指为人处世顺着自己的本性而为,拒绝矫揉造作。梁氏拈出“自然”概念,一方面是因为他发现了陶渊明的思想或曰人生观,与他当时所处环境里众人谈玄礼佛的密切关系,更重要的也许是梁氏欧游归来,因眼见欧洲科学发达而带来的人们外部生活急剧变迁,内部生活摇荡迷惘<sup>[9]75-77</sup>,而极力为现代人寻求安生立命的所在,来抵抗外界的种种困苦。因缘际会,梁氏发现陶渊明贫寒交迫,却能快乐悠然,是以勤加考证研究,终于发现陶氏的快乐密码——自然。“自由”的概念,来自西方,梁氏用来品评陶渊明的人生观,显然意义与西方语境中的自由有所不同。在梁氏看来,此自由,含有参透、超脱、“与时俱化,而无肯专为”的意味。这也同样带有科学万能梦破碎之后,为摆脱思想危机与生存危机,确立人生价值,探求人类该如何存在的诉求。

## (二)梁氏的历史研究方法:重建历史语境,为研究对象搭建有效平台

梁氏进行屈原研究,面临的最大问题,即是史料的匮乏。“屈原的历史,在《史记》里头有一篇很长的列传,算是我们研究史料的人可欣慰的事。可惜议论太多,事实太少。”<sup>[9]158</sup>所以对于屈原的生平、身世与遭遇,只能凭借这篇记载大致推测。好在研究的对象是作为文学家的屈原,他有大量的诗作传世,所以在梁氏那里,屈原的作品或者说屈原的诗句,成为梁启超研究屈原最有价值的史料。于是,梁氏在根据史书记载的资料考证清楚屈原的作品篇目之后,主要依据屈原的诗句开始了对屈原人格的探究。首先,梁氏在《山鬼》《远游》《离骚》《涉江》《思美人》等作品中,提取出屈原表达自身志向和思想见解的诗句,比而观之,指出“在屈原脑中,含有两种矛盾的原素。一种是极高寒的理想,一种是极热烈的感情。”<sup>[9]163</sup>在梁氏看来,正是这种极高寒的理想,使屈原异于流俗,反抗社会,同时正是那种极热烈的情感,使他可以与恶俗社会以性命相搏。其次,梁氏同样从《离骚》《抽思》《惜诵》《湘君》《渔父》《怀沙》《橘颂》等作品中,提取出屈原叙写少年怀抱、遭受打击、沉痛缠绵及思想求索的诗句,比而观之,指出屈原尽管被疏远、被放逐,但断然拒绝与世俗同流合污,断然排斥“迁就主义”,追求“独立不迁”、宁死不屈的高洁品格。再次,梁氏从《离骚》《远游》《涉江》《河伯》《招魂》《思美人》等诗作中,提取出屈原表现内心中常常出现的冲突——既然不肯迁就,敢问路在何方的诗句,比而观之,指出屈原“登高不说”“入下不能”“超现实的生活不愿意做,一般人的凡下现实生活又做不来,他的路于是乎穷了”。<sup>[9]172</sup>最后,梁氏引《哀郢》《抽思》《涉江》《惜诵》《渔父》《怀沙》《国殇》的诗句,比而观之,指出屈原逐步觉悟到“他和恶社会这场血战,真已到矢尽援绝的地步”,“他可以死而且不能不死,他便从容死去。”“汨罗一跳,把他的作品添出几倍权威,成就万劫不磨的生命,永远和我们相摩相荡”,“屈原不死!屈原惟自杀故,越发不死!”<sup>[9]174</sup>就这样,梁氏在自己的钩沉、排比而出的史料编织成的历史语境之中,发掘出了屈原人格的伟大与崇高。

梁氏的陶渊明研究,与屈原研究有相类似之处,他已然将陶渊明的诗歌作品,作为其人格研究的最大史料。他借助于对陶渊明诗句的摘取、排比,编织出陶渊明真实生活的历史语境,并在这样的语境中,依次揭示出陶渊明全人格中潜伏的特性,陶渊明一世生活的单调、贫寒,陶渊明快乐、悠然的生活态度,以及支撑陶渊明高尚的品格与文艺的人生观:自然与自由。值得注意的是,在文章的开始部分,为充分论述陶渊明的文艺及品格,梁氏还对陶渊明的家世、时代、乡土及时代思潮进行了考证与描述,这部分虽然所占篇幅不多,但也显示了梁氏对陶氏所生存时代的历史语境进行重建的努力。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梁氏在论文陶渊明的文艺及其品格一文的起始处,提出“批评文艺有两个着眼点,一是时代心理,二是作者个性”<sup>[11]</sup>的文学观。这个观点,从文化诗学的角度来看,是不充分的。文化诗学研究编织历史语境,是为了在历史语境中对作家、作品进行全方位的透视,是为了对文学现象做寻根探源式的研究,并不仅仅局限在上述两个方面。其实,这也是梁氏的历史化文学研究与文化诗学研究的不同所在,是我们进行文化诗学研究时需要注意和反思的地方。

## 结语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文学研究对文化诗学的启示,在本文的分析与透视中,也许还未充分挖掘出来,但相信从本文的梳理中,我们已然发现了梁氏的著作对将来文化诗学研究的重要价值。其实,不仅仅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文学研究可以作为学术遗产拿来继承,正如李春青教授所指出的那样,整个现代学术传统,由于“一则距离我们今日最近,与当下文化状态联系最为密切;二则因为现代学术传统乃是中、西对话交融的产物,是一种新的熔铸,而当今我们依然处于这样的文化语境之中”<sup>[12]</sup>,都应该作为宝贵的学术财富而进行充分的开掘。因此,文化诗学的研究者应积极研究借鉴现代学术传统,“总结现代学术的‘得’与‘失’,进而在其基础上‘接着说’”,以期建构本土化的“文化诗学”或曰“中国文化诗学”<sup>[13]</sup>。

## 参考文献:

- [1]姚爱斌. 移植西方与植根现实——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诗学研究的两种理论取向[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8(4): 116-120.
- [2]李春青. 论文化诗学的基本特征与操作路径[J]. 江苏行政学院学报, 2014(3): 38-45.
- [3]童庆炳. 文化诗学:宏观视野与微观视野的结合[J]. 甘肃社会科学, 2008(6): 132-135.
- [4]李春青, 史钰. 徘徊于理论与历史之间——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研究路径讨论之一[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2(5): 41-53.
- [5]王岳川. 新历史主义的文化诗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97(3): 23-31.
- [6]童庆炳. 文化诗学结构:中心、基本点、呼吁[J]. 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2(2): 45-52.
- [7]童庆炳. 植根于现实土壤的“文化诗学”[J]. 文学评论, 2001(6): 35-40.
- [8]梁启超. 中国历史研究法[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 [9]金雅. 中国现代美学名家文丛:梁启超卷[C].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 2009.
- [10]高旭东. 高旭东讲鲁迅[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13-124.
- [11]李剑锋. 近现代陶渊明研究的开创者梁启超[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2(3): 55-59.
- [12]李春青. 论“古史辨”派<诗经>研究的得与失[J]. 河南社会科学, 2014(3): 16-23.
- [13]李春青. “文化诗学”的本土化与“中国文化诗学”之建构[J]. 文艺争鸣, 2012(4): 63-68.